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备受欺凌的人们

经典名著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世 / 界 / 经 / 典 / 名 / 著 / 文 / 库

备受欺凌的人们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李 霞 赵春梅 译

谷 羽 审校



中国和平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备受欺凌的人们/(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李霞,赵春梅译.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9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7-80154-164-2

I. 备… II. ①陀… ②谷…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 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735 号

备受欺凌的人们

[俄]陀思妥也夫斯基 著

李霞 赵春梅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10.875 印张 31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4-164-2/G·157

定价:13.00 元

主要关系人物表

伊万·彼得罗维奇——书中的“我”，小称万尼亚，在伊赫缅涅夫家长大，作家，深爱着娜塔莎。

杰里米·斯密特——侨居俄国的英国人，涅莉的外公，穷困潦倒的工厂业主，死在米勒糖果店外。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小地主，出身于破落的名门望族，娜塔莎的父亲。

娜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小称娜塔莎，娜塔申卡·娜塔舍奇卡，伊赫缅涅夫夫妇的独生女，开始与万尼亚相爱，后来与阿辽沙私奔，最后又被阿辽沙遗弃。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舒米洛娃——伊赫缅涅夫之妻，娜塔莎的母亲。

玛特辽娜——伊赫缅涅夫家的女仆。

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大地主，伊赫缅涅夫的邻居和主人。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小称阿辽沙，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之子，娜塔莎的情人，遗弃娜塔莎后与卡佳结合。

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菲莉蒙诺娃——小称卡佳，伯爵夫人的继女，阿辽沙的未婚妻。

季娜伊达·费奥多罗芙娜——伯爵夫人，卡佳的继母。

叶莲娜——小称莲娜奇卡·涅莉奇卡，别名涅莉，斯密特的外孙女，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和斯密特女儿的私生女。

马斯洛鲍耶夫——别名菲利普·菲利佩奇，万尼亚的同学，私人侦探。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	84
第三部·····	166
第四部·····	250
尾声 最后的回忆·····	312

第一部

第一章

去年3月22日傍晚,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我一整天都在城里奔波,想找一处住所。旧居实在太潮湿,而我当时又咳嗽得非常厉害。秋天我就想搬家,却一直拖到春天。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第一,我想找一所单独住宅,而不是同别人合住;第二,即使只有一个房间,但一定要宽敞,当然房租也要尽量便宜些。我觉得,人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连思想也会变得狭隘起来。我在构思新作品的时候总喜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顺便说一句,我总觉得构思作品、想象着作品写成后将是什么样子,要比真正动笔去写更令人愉快。这的确并非由于懒惰,那又是为什么呢?

早晨我就觉得不舒服,日落时分情况更糟了:我开始时热时冷,好像得了寒热病一样。再说我跑了一整天,已经疲惫不堪了。傍晚,当薄暮笼罩大地的时候,我沿沃兹涅赛斯基大街走着。我喜欢彼得堡三月的阳光,尤其是晚霞,当然是那种晴朗的、寒冷黄昏时分的晚霞。整条街道会骤然明朗起来,沐浴在灿烂的光芒之中。所有的房子似乎一瞬间都变亮了,甚至连房子本来的灰色、黄色、灰绿色也都顿失其原有的阴郁色彩,人的心胸仿佛也豁然开朗,心灵似乎受到了震撼,或者就像有人用胳膊肘轻轻撞了你一下,使你产生新的观点和许多新想法……一道阳光竟然能对人的心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阳光消失了,寒气更加逼人,我开始不时地擤、擦鼻子,暮色更浓重了,店铺里的煤气灯也点亮了。走到米勒糖果店时,我突然一下子僵住了,停在那儿看着街对面,好像预感到了立刻就会遇见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街对面的那个老人和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就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都抽紧了,可我自己也说不清那究竟是种什么感觉。

我并不是神秘主义者,几乎从不相信预感和占卜,然而,可能和大家一样,我在一生中也遇到过几件简直无法解释的事情。就说眼前这个老人吧:为什么当时我一见到他马上就预感到那天晚上我会遇到一桩不同寻常的事呢?不过,我那天正在生病,病中的感觉几乎总是靠不住的。

老人佝偻着身子,拐棍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的石板,像棍子一样僵直似乎不会弯曲的双腿,缓慢、吃力地挪动着往糖果店走去。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这么奇怪、丑陋的人。在此次相逢之前,每次在米勒糖果店附近碰见他,我都感到十分惊奇。他身材高大,脊背弯曲,长着一张八十岁老人似的死气沉沉的面孔,穿着一件衣缝已经开绽的大衣,头上是一顶戴了有二十年的破旧圆帽,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只有后脑勺还剩下一小撮已不再是灰白而是黄白色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是毫无意义的,仿佛身上有根发条在驱动他似的——这一切使所有初次见到他的人都不免会惊奇不已。看到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孤单单,无人照顾,确实有点奇怪,况且他又很像是从看护人那里偷逃出来的疯子。令我感到惊奇的还有,他实在太瘦了:他身上几乎没有肉,简直就是皮包骨头。发黑的眼眶里两只大大的、浑浊无神的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从不旁顾,而且我相信,他总是视而不见的。即使他眼睛看着您,仍然会直直地朝您走去,仿佛他眼前是一片空地。这种情形我见过好几次了。他是不久前才到米勒糖果店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而且他身边总带着一条狗。糖果店里的顾客们从来没有人想要和他攀谈几句,他自己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他为什么要到米勒糖果店去?他在那里干什么?”我站在街对面不由自主地望着他,暗自思忖。一种难言的惆怅涌上我心头——这是

疾病和疲劳造成的。“他在想什么？”我继续暗暗寻思，“他脑袋里在琢磨什么？现在他的大脑还能思考什么吗？他的面部肌肉僵死，毫无表情可言，还有这条讨厌的老狗，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它与他形影不离，仿佛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它和他又是那么相像。”

这条倒楣的老狗似乎也有八十多岁了，是的，肯定是。首先，它的外表看上去要比通常看到的任何一条狗都苍老；其次，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看到它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它不可能与其它的狗是一样的，它与众不同，非比寻常：它身上一定有一种离奇的，着了魔的东西，它也许是化为狗形的魔鬼，它的命运通过种种神秘莫测的途径同它主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它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吃的最后一顿饭，你只要看它一眼马上就会同意我这种看法。它瘦得犹如一具骷髅，或者说就像它的主人一样，其实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它身上的毛几乎全掉光了，尾巴也光秃秃的，而且老是耷拉着，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忧郁地低垂着。我这辈子还从没遇到过这么讨厌的狗。当他们在街上行走时，总是主人在前，老狗紧随其后，狗鼻子贴着主人衣服的下摆，仿佛黏在上面了一样。二者的步态和他们的模样几乎是每一步都在宣告：

“我们老了，真老了，天啊，我们是多么苍老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突然想到，这个老人和这条老狗或许是从加瓦尼^①画插图的霍夫曼^②作品的书页中爬出来的，此刻正在为它的出版大作活动广告。我穿过马路跟着老人走进了米勒糖果店。

老人在店里举止非常古怪，站在柜台后面的米勒近来已经开始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表现出了一脸的不满。首先，因为这位怪客从来不买什么吃喝，每次他都是径直朝屋角的火炉走过去，找一把椅子坐下。如果炉边的位置被别人占了，那么，他就莫名其妙地在占了他位置的那位先生面前站一会儿，然后好像大惑不解似地离开那儿，向靠窗戶的一个角落走去，在那里找一把椅子，慢慢地坐下，摘掉帽子，放在身边

① 加瓦尼(1804—1866)，法国讽刺画家。

② 霍夫曼(1776—1822)，德国小说家和作曲家。

的地板上,再把拐棍放在帽子旁边,然后往椅背上一靠,一动不动地连续坐上三四个钟头。他从不拿一张报纸,也不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音也不发;他只是坐着,睁大眼睛,凝视前方,可他的目光呆滞又毫无生气,你甚至可以打赌,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视而不见的。那条狗在他脚下原地转了两三圈后,闷闷地趴下了,它把鼻子伸到主人的两只靴子中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同样也是一动不动地待一个晚上,仿佛在这段时间里死过去了一样。这两个生物似乎整天都如死人一般躺在某个地方,太阳落山时,他们才突然复活,这只是为了走进米勒糖果店去履行某种神秘莫测、无人知晓的使命。坐了三四个钟头以后,老人终于站了起来,拿起他的帽子,动身往不知是在何处的家走去。那条狗也爬了起来,仍然耷拉着尾巴,低着头,迈着和平常一样迟缓的步子,机械地跟在主人身后。后来,糖果店的顾客都开始想方设法地回避这个老人,甚至不愿意坐在他附近,似乎他很讨人厌。对此老人却毫无觉察。

这家糖果店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德国人。他们从沃兹涅赛斯基大街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他们大都是些各种各样店铺的老板:五金店老板、面包店掌柜的、染坊主、帽商、马具店东家——全是些古板守旧(就这个词的德文意义而论)的人物。米勒店里的一切都有一种古板守旧的味道。店主经常走到熟客身边,坐在他们的桌旁,和他们一起喝光几杯甜酒。店主家的那些狗和他的几个年幼的子女,有时也跑到顾客身边去,顾客往往抚摸抚摸狗或逗逗孩子们。大家彼此很熟,相互尊敬。当客人们专心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店主的房门里传来了破钢琴弹奏的《我亲爱的奥古斯汀》^①的乐曲声,这是店主的大女儿在弹琴,她是个长着满头浅色鬈发的德国女孩,很像一只白老鼠。她演奏的这支华尔兹舞曲大家都很喜欢听。每月月初,我都要到米勒店去阅读他订的俄文杂志。

我走进糖果店,看见那老人已经坐在了窗前,那条狗象往常一样直挺挺地躺在他脚边。我悄悄地在角落里坐下,暗暗扪心自问:“我

^① 当时在德国小市民中流行的一首小调。

为什么要进来？此时此刻我来这里根本无事可做，况且我又在生病，本该尽快赶回家去，喝点热茶，上床休息。难道我到这来果真就是为了看看这个老人？”我感到十分懊丧。”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着，同时记起了刚才在街上见到他时的那种奇怪、痛苦的感觉。“我同这些枯燥乏味的德国人又有什么关系？这种古怪近乎玄妙的情绪有什么用呢？近来我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种对日常琐事廉价的忧虑有什么用？它既妨碍我生活，又使我无法清楚地认识人生。一位思想深刻的批评家在激情地评析我最近的一部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了这一点。”我沉思着并开始懊悔，可是我的身体依然留在原地没动，同时我的病也越来越重，最后，我竟然舍不得离开这间温暖的房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报，刚读了两行便开始打盹。德国人并不打扰我。他们读着报纸，吸着香烟，只是偶而（大约半小时一次）低声交谈一阵儿法兰克福的某桩新闻，或者聊一聊德国著名才子沙菲尔^①的妙言警句，而后，他们便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重又专心致志地埋头读起报纸来。

我睡了约有半个小时就被一阵猛烈的寒颤弄醒了。确实应该回家了。可这时店里演出的一幕哑剧再次把我拖住了。我已经说过，那个老人一旦在他的椅子上坐定，他的目光便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而且整个晚上不再把视线挪向另一个物体。我也曾受到过他那毫无意义的、固执又一无所见的目光的盯视。那种感觉是极不愉快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一般情况下，我总是尽快换一个位置。而此刻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矮小的、圆滚滚的、衣着整洁的德国人，他竖起来的衣领浆得笔挺，脸色异常红润，他是最近从里加来的客商亚当·伊万内奇·舒尔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米勒的好朋友，但还不认识那老人和店里的许多顾客。他正津津有味地读着一份名为《乡村理发师》的德文报纸，啜着甜酒，蓦地抬起头，发现那老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使他觉得窘迫难当。亚当·伊万内奇和所有“高贵的”德国人一样，是个敏感易怒、气量很小的人。他觉得，被人如此无礼地盯着看很奇怪，同时也感到倍受侮辱。他强压怒火，把视线从这个无礼的蠢客身上移开，低声嘟囔了几句，就

^① 沙菲尔(1795—1858)，德国幽默作家。

悄悄地躲在报纸后面。然而他又忍不住,过了两三分钟,他疑惑地从报纸后面往外看了一眼:仍然是那固执的目光,仍然是那毫无意义的盯视。亚当·伊万内奇这次依然保持了沉默。可是当同样的情况重复第三次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认为维护自己尊严,不使堂堂里加城的声誉在高贵的顾客心目中受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许他自认为是那个城市的代表。他忍无可忍,猛地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摔,拿起手杖在报纸上狠狠地一敲,于是报纸就粘在手杖上了。他带着一副个人尊严不可悔的神情,浑身上下因甜酒和自尊心受侮而变得通红,这次他也用自己充血的小眼睛回敬似地死盯着那个惹他生气的老人。这两个人——德国人和他的对手好像都想借自己目光的力量制服对方,等着看是谁先难为情,先垂下视线。拐杖的敲击声和亚当·伊万内奇的古怪态度引起了所有顾客的注意。大家都立刻放下报纸和酒杯,默默地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看着两个对手。这个场面变得十分滑稽。此时满脸通红的亚当·伊万内奇两只挑衅的小眼睛里的威慑力已消失殆尽,而老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气得发疯的舒尔茨先生,根本就没有发觉他已经成了大家好奇心的目标,仿佛他的脑袋在月亮上,而不在地球上。亚当·伊万内奇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死死地盯着我?”他用德语喊道,声音尖厉刺耳,样子十分吓人。

可老人依然是一言不发,似乎没有明白,甚至根本没有听见他的问话。亚当·伊万内奇决定改用俄语再问他一遍。

“我温你,你为什么这样目不转睛地钉着我?”^①他愈加愤怒地喊道:“我可是宫中的名人,你是什么人?无名之辈!”他补充一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可是那老人连动也没动一下。一些德国人十分愤慨,议论纷纷。米勒先生被喧闹声吸引过来,走进了房间。等他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他认为那老人可能是个聋子,于是就俯到他耳朵上说:

“舍尔茨仙生请您不要死钉着他。”他尽力大声地说,并且目不转睛地

^① 此句原文中有错误,说明舒尔茨俄语说得不好。

凝视着这个古怪的顾客。

老人机械地看了米勒先生一眼，他那张生硬呆板的脸上忽然露出一一种惊慌失措的表情。他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地弯腰去够帽子，慌忙把它和手杖一起抓在手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带着可怜的微笑——就是那种穷人因坐错了位子而被人赶出去时所特有的备受侮辱的微笑，准备离开这间屋子。这个可怜的、病弱老人的那种卑微顺从、俯乎帖耳的慌乱神情是那么惹人怜悯，那么令人心痛，以致于所有在场的人，从亚当·伊万内奇起，立刻都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显然，这个老人非但不可能欺侮任何人，而且连他自己都非常清楚，他会随时被人家像乞丐一样从任何地方赶走。

米勒是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拍拍老人的肩膀鼓励他说，“你坐着吧！Aber^① 舒尔茨 rep^② 恳求您不要老是盯着他看。他在宫中可是个有名望的人。”

但是可怜的老人连这个也没听懂，他比刚才更加手忙脚乱起来，弯下腰捡起他的手帕，那是从他帽子里掉出来的一条又破又旧的蓝色手帕，然后开始叫狗，可那条狗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狗鼻子插在两只前爪中间，似乎睡得很香。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颤抖的、老年人特有的嗓音含糊不清地叫道，“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还是一动也没动。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满脸愁苦地连声叫着，并用拐杖碰了碰那条狗，可是它依然躺着不动。

拐杖从他手里掉了下来。他弯下腰，跪着用双手捧起阿佐尔卡的脑袋。可怜阿佐尔卡，它已经死了。它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主人的脚下，也许是老死的，但也许是饿死的。老人望了它一会儿，他十分惊讶，好像还没明白阿佐尔卡已经死了似的。然后他轻轻地向自己过去的奴仆和朋友俯下身去，把自己苍白的脸贴在狗脸上。默默地呆

① 德语：但是。

② 德语：先生。

了半晌,我们都被感动了……后来这个可怜的老人慢慢站了起来,他面如死灰,全身抖个不停,象得了寒热病一样。

“可以把它制成舒舍尔,”很有同情心的米勒说,他想尽可能给老人一点安慰(他说的舒舍尔就是标本),“可以制成很好的标本,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做标本做得好极了,他是个做动物标本的老手。”米勒一边重复着,一边拾起地下的拐杖递给老人。

“是的,我做标本做得很好。”克里格尔先生自己走上前来,十分谦虚地证明说。

他是一个瘦高的、十分善良的德国人,满头成络的红头发,鹰钩鼻子上戴着一副眼镜。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在制作精美标本方面很有天才。”米勒补充说,同时为自己的好主意感到十分激动。

“是的,我真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能制作各种精美的标本,”克里格尔先生又一次证明道,“而且我可以不收钱,免费把您的狗制成标本。”他怀着慷慨的自我牺牲精神补充说。

“不,您制作标本,我来付钱!”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发疯似地喊道,他的脸色比刚才更红了,这次他显得十分慷慨大度,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是这一切不幸的起因。

老人听着这一切,显然他一点儿也没听懂,他仍旧和刚才一样浑身抖个不停。

“等一等,咱们喝一杯上等白兰地吧!”米勒见那个神秘莫测的客人竭力要走,便大声叫道。

白兰地端来了。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可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酒杯还没举到唇边,酒已经洒了一大半,他滴酒未喝就把酒杯放回了托盘。接着他怪怪地、不合时宜地微笑了一下,便颤巍巍地快步走出了糖果店,把阿佐尔卡留在了原地。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屋里一片唏嘘的叹息声。

“Schwernoch! Was für eine Geschichte?”^① 那些德国人睁大了眼睛,

^① 德语:真糟糕!这是怎么回事?

面面相觑地说道。

我马上冲出去追赶那位老人。在距糖果店几步远的地方向右拐，有一条又窄又暗的小胡同夹在一些大房子中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提醒我，那老人肯定是拐到胡同里去了。右手第二幢房子尚未建成，周围全是脚手架。房子四周的篱笆几乎伸到了胡同中央，紧挨着篱笆墙，铺着供行人过往的木板。在篱笆和房子黑暗的夹角处我找到了老人。他胳膊肘撑在膝上，双手抱着脑袋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上。我便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听我说，”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您别再为阿佐尔卡伤心啦。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别难过了，我马上去叫辆车，您住在哪儿？”

老人没有回答。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胡同里也没有过往的行人。突然，老人抓住了我的手。

“我闷得慌！”他用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真闷啊！”

“我们回您家去吧！”我一边大声说着一边站起身，用力地拉他起来，“您回家喝点茶，然后卧床休息……我这就去叫马车。我要给您找个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我不记得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本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刚抬了抬身子，便又跌坐在地上，又用他那沙哑的、喘不过气似的声音喃喃地说了起来，我弯下腰再靠近他一些，只听他说道：

“在瓦西里耶夫岛上，”老人嗓音嘶哑地说，“六道街……第六道大街……”

老人便不说话了。

“您住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吗？可您走错了方向，应该向左拐，而不是向右。我马上就把您送到……”

老人没有动。我拉起他的一条手臂，可手臂象死了一样滑落下去。我看了看他的脸，摸了摸他——他已经死了。我觉得这一切恍如梦境。

这个意外事件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在这期间，我的寒热病倒自然而然地好了。老人的住处找到了。不过，他并不住在瓦西里耶夫岛，而是住在离他去世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的克卢根的大楼里，那是紧靠屋顶的五层楼上一套单独的住宅，包括一个小过道和一个虽宽敞却很低矮

的大房间，房间里开了三个窄缝权当窗户。他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全部家当就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破烂不堪、硬得象石头一样的长沙发，沙发里面的小楔树内皮从几个地方露了出来；甚至连这几件东西也都是房主的。火炉显然已经很久没有生火了，蜡烛也找不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老人之所以想到米勒的店铺里去，只是为了找个有光亮的地方坐坐，暖暖身子。桌子上有一只空空如也的陶制杯子，旁边是一片又干又硬的面包皮。连一个戈比也找不到，甚至找不出另一套换洗的衬衣给他下葬穿，最后还是别人捐出自己的衬衫给他做了寿衣。显然，他不可能这样完全孤独地生活，肯定有人来探望他，哪怕只是偶尔来一次。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原来死者是个外国人，却是俄国臣民，名字叫杰里米·斯密特，是个机械师，七十八岁。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另一本是“新约”的俄译本，“新约”的页边空白处写有铅笔字和手指甲刻划的记号。这两本书我拿走了。我向其他房客和房主打听死者的情况——大家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这幢大楼里房客很多，大都是手艺人 and 德国女人，她们出租房屋并提供膳食和仆役。大楼的管理人出身贵族，他对这个房客也是知之有限，除了这套住宅每月房租六卢布，死者在此住了四个月，而最后两个月的房租分文未付，因此只得把他赶走之外，管理人便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我又问起是否有人来看望他，但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幢楼房很大，到这个“诺亚方舟”里来的人很多，谁也无法把他们一一都记住。大楼里的看门人在这儿工作了五年，他也许能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他两星期前回家乡休假去了，留下他的侄子替他看门，这个年轻小伙子连一半房客还认不全呢。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的那些查询是如何结束的，但是老人终于被埋葬了。那些日子，虽然我有很多事情，可我还是抽空去了一趟瓦西里耶夫岛的六道街，到了那里以后便只觉得自己可笑：在六道街上除了一排排普普通通的房子之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老人在弥留之际究竟为什么要提到六道街和瓦西里耶夫岛呢？难道他只是说胡话？

我看了看斯密特留下的空房子，很喜欢它。我就把它租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房间很大，虽然房顶太低，起初我总是担心脑袋会碰到天花

板,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每月只需六卢布房租,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这套单独的住宅吸引了我,余下的事就是设法找一个佣人,因为一个佣人也没有是无法过下去的。看门人最初答应每天至少来一次,另外,在必要时也可以来帮帮我。谁知道呢,我想,也许会有人来探望老人。然而,他死了已经五天了,还没有一个人来过。

第 二 章

在那个时期,即一年以前,我仍在给几家刊物撰稿,写写小文章,并且坚信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写出大部头的好作品。当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出乎意料的是后来我却住进了医院,写作就完全停止了,而且我相信我很快就要死了。既然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回忆录呢?

我不由自主地一直在回忆我一生中这痛苦的、最后的一年。现在我要把它全部记录下来,我觉得,倘若我不是以写作为业的话,我早就抑郁死了。过去的种种印象常常令我痛苦不堪,若遣之笔端,它们就会变得缓和一点,轻松一点,而不再像吃语、恶梦那般可怖。我是这样想的。单纯、机械地写作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令我感到安慰,使我冷静,能唤起我往日著书立说的习惯,能把我的回忆和痛苦的梦想吸引到工作中去……是的,我想的是个好主意。况且这也可以给医院的看护留点东西,至少冬天在安装双层窗框时可以用我的手稿糊窗户。

但是,我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我是从中间写起的。既然要把一切都写出来,那就应该从头写起。好吧,我们就从头讲起吧,不过,我的自传并不很长。

我不是在本地出生的,而是生在遥远的某省,应该说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但是他们在我童年时候双双去世了。我是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家中长大的,他是一个小地主,出于怜悯收养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娜塔莎,比我小三岁。我和她像亲兄妹一样一同长大。啊,我幸福的童年啊!一个人到了25岁仍然怀念、惋惜自己的童

年,临终时分仍满怀热情与感激只想到童年,这是何等愚蠢啊!那时天上的太阳是那样明亮,与彼得堡的太阳截然不同,而我们两颗幼小的心是那么活泼、愉快地跑动。周围都是田野和森林,不像现在到处尽是一堆堆死气沉沉的石头。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管理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花园和公园都美极了。我和娜塔莎常常到那花园里去散步,花园后面是一片潮湿的森林,我们两个小孩有一次在那儿迷了路。真是快乐的黄金时代!生活第一次撩开了它神秘、诱人的面纱,生活的滋味真是甘美如饴。在那些日子里,每一簇灌木丛后面,每棵树后面都仿佛住着什么人,神秘莫测,我们看不见他;童话世界和现实生活都融合在一起了;每当深谷里渐浓的夜雾,像一条条曲折蜿蜒的白色带子罩住紧贴在我们这个深谷石壁上的灌木丛时,我总是和娜塔莎手拉手站在山谷边,又胆怯又好奇地望着深深的谷底,期盼着马上就会有人出现,走到我们面前,或者在烟雾缭绕的谷底回答我们的呼唤,那样,我们的保姆讲过的童话故事就会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了。很久以后,我曾经偶然向娜塔莎提起过那段往事。有一天我们弄到了一本《儿童读物》,我们立刻就跑到花园的池塘边,那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树下有一张我们喜爱的绿色长凳,我们俩坐下来便开始读《阿尔封斯和达琳达》那篇神奇的童话。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个故事,心里仍不免会有一种奇怪的冲动。一年前,我给娜塔莎背诵故事的前两行“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阿尔封斯出生在葡萄牙,堂·拉米尔是他的爸爸……”时,我差点哭出来。那情景大概太荒唐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当时娜塔莎才那么古怪地对我的激情笑了笑。但是她马上醒悟过来(我现在还记得)并且为安慰我,她自己也回忆起往事来了。说着说着,她自己也变得激动起来。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地回忆着往事,想起了我被送往省城寄宿学校的事儿——天啊,那时她哭得多么伤心啊!——也想起了我永远离开瓦西里耶夫斯科耶那天我们最后分别时的情景。当时我已经在寄宿学校毕业,正准备去彼得堡上大学。那一年我十七岁,她不满十五岁。娜塔莎说,当时我长得高高瘦瘦的,一点也不匀称,人们见了我都忍不住想笑。分别的那一刻,我把她叫到身边,想对她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可我的舌头不知为什么突然麻木了,动转不灵。她还记得我